



中国早期文明

李济 著



五
賁
于
丘
邗
東
帛
交
各
終
吉
六
五
柔



中国现

中国早期文明

李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文明/李济著.—2版.—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541-2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远古文化-文化史-中
国 IV. ①K2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229 号

责任编辑 罗俊华

封面设计 张志全工作室

中国早期文明

李 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145,000

2017 年 12 月第 2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41-2/K·2643

定价 38.00 元

本书出版说明

本书收入李济先生有关中国古代文明探索和研究的论著七种。

《中国文明的开始》，是李济先生应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主任泰勒之请，于1955年在该校所作三次学术讲演汇集；翌年，该校将这三次学术讲演汇集以英文出版，以后又曾五次再版；1970年被译成中文，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部学术讲演集中，李济先生以安阳考古发掘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及中华民族滋生成长的关系，作了简明而又系统的叙述和推论。

《古代中国文明》，是李济先生用英文为美国1961年版的《柯里尔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1996年李济先生哲嗣李光谟从李济先生的遗稿中发现此文付印稿的副本，遂将其译成中文，并在1996年第八期《考古》上发表，以纪念李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是李济先生以二十世纪初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成果，对中国史前文明所作的描述和解说。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和《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是李济先生关于中国上古史问题的讲演及撰稿。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讲演中，李济先生对运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问题作了明晰的阐述：“我们谈中国上古史，第一个责任，就是根据现在可以得到的材料，来解答它们”，“整理田野考古发掘所得的资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地下发掘的资料，与传下来的记录资料连缀起来”，“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有一部这样的中国上古史出现”。《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正是李济先生为由他亲自主编的《中国上古史》所撰写的“史前部分”一章；该书于1972年以“待定稿”的形式在台北出版，1985年再版时，李济先生已逝世，因此，2006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济文集》和本书据此收入的本文，都是李济先生生前的未定稿。

《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和《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是李济先生 1926 年对山西汾河流域所作考古调查及对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记录和报告。这既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次用考古的手段和方法探索地下史前中国文明的成果，也是中国考古事业和现代考古学发轫的标志，李济先生因此而获得“中国考古第一人”之誉。2006 年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济文集》和本书据此收入的本文，前者是李济先生哲嗣李光谟于 1996 年将 1927 年发表的英文本译成中文，并在 1996 年第八期《考古》上发表的文本；后者以 1927 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出版的文本为底本。

李济先生的这些论著，不仅记录了中国学者以考古学家的锄头第一次对地下中国史前文明的探寻，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学者以历史学家的学识对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深邃思考；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弥足珍贵的史料，也是深入探索和研究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历史文献。

为满足学术界和广大读者需要，我们将李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索和研究的这七种论著从《李济文集》中选出，汇为一书，并按单行要求，对全书作了再次审读和必要的技术处理；李光谟先生建议本书书名改称《中国早期文明》，特此予以说明。

目录

本书出版说明 / 1

中国文明的开始 / 1

叶序 / 3

著者序 / 7

第一讲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 / 9

第二讲 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它早期的发展 / 20

第三讲 中国的青铜时代 / 31

古代中国文明 / 55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 / 62

踏入文明的过程——中国史前文化鸟瞰 / 77

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 / 111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 / 125

附文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 / 148

中国文明的开始*

* 本书于1957年由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出版部用英文出版，包括著者1955年在该校所作的三篇学术讲演，出版后十余年间曾发行5版，1970年，万家保将其译成中文于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纪出版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济文集》，收入的是1980年中文第二版。本书从《李济文集》辑出，除对一些舛误遗漏处作了补正外，未作重大改动，在此谨向原译者表示感谢。——编者

叶 序

李济教授所著《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书,初版发行于1957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迄今已印行至第四版。稍后印行的纸面普及本,更印至第五版。这一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在国外拥有如此多的读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和济之先生相识多年,深知其治学为人的精神与风格。他自获得哈佛学位回国后,就一直把他的精力贡献于中国科学的开拓,尤多致力于考古学及人类学在中国的播种工作。他是具有多方面科学素养和兴趣的人。他曾在克拉克大学研习心理学和社会学,获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其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他在哈佛大学为他老师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发明了一套新的迷宫测验法(maze),曾被这位心理学大师在国际会议上大事宣扬。

在民国二十年前后,那一段中国科学由播种而开始结果的日子里,他和一群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如丁文江、傅斯年、安特生(J. G. Andersson)、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步达生(Davidson Black)等共同提倡科学的研究工作。由这一群科学家的努力,得到两件值得中国学术界骄傲的成就,其一为北京人的发现,另一就是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后者就是在济之先生领导下进行的。罗杰斯教授说,安阳殷墟遗址的发现,其重要性可与谢里曼对特洛伊城的发现,互相争辉,互相媲美,现在看来,实非过誉之辞。安阳发掘的成就使中国信而可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强有力的链环。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国古代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殷墟出土了很多华丽绝伦的青铜器,雕琢精美的玉器、石器、骨器以及造型优雅的陶器,这些文化遗产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智慧和才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大批有字甲骨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得中国文字

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有了确实可靠的证据。像这样的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文字体系,在世界上,恐怕只能在中国文字中才能找到。

由于这些卓越的成就,济之先生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所推重,而被选为该会荣誉研究员。该会成立于1662年,拥选外籍荣誉研究员的标准极为严格。在民国二十六年,济之先生又被瑞典当时的皇太子,现在的国王,一位卓越的汉学家,请去讲演,由于他们的志趣相投,便成了朋友。

1954年,先生应洛氏基金会之邀,赴美讲学,滞美期间更应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主任泰勒教授之请,对该所研究生作了三次有系统的公开讲演。这三次讲演的记录经整理之后,就是这一册《中国文明的开始》。此外,其中的第一讲亦在剑桥的哈佛燕京社和墨西哥城讲过。第二讲也分别在哥伦比亚大学及墨西哥城讲过。第三讲在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讲过。这本书在美出版之后,立刻被许多欧美国家的大学考古学系及其有关的科系,采作教材或被指定为主要的参考书籍。

近代中国的考古学,对现代中国的史学界,甚或对近代整个中国的科学上的贡献是大家共知的事实。这一门学问在中国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开始滋长发展而又为当代世界科学界所瞩目和赞赏的学问之一。自本书出版后,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著述甚多,其大部分都是专门性的学术论文。但本书的价值依然存在,因为在这里,他把数十年的积学和丰富的考古经验,包括他所领导的安阳发掘的成果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及中华民族的滋生长成的关系,作一简明而有系统的叙述和推论。书中并且引用了很多图版、图表和图片来加强叙述的效果。那些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十分珍贵。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能以清新的笔触,描述繁复的问题,深入浅出,言之有物,无论是专家或一般读者,都能加以欣赏。

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有鉴于此书的价值,特请万家保君担任翻译工作,把它译成中文。万君服务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济之先

生的指导下，研究殷代青铜器的技术问题，已有多年，平日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其对本书旨趣领会尤深，担任此项工作最为适宜。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一译本的出版，并且乐于替它写几句话来介绍给爱好中国文化的读者。

叶公超

一九七〇年三月于台北

著 者 序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主持的安阳地区殷朝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始自 1928 年冬。这工作几乎从无间断地继续到 1937 年夏天。当时日本侵略华北，使这项非常重要但才完成一半的工作，完全停止。

在战争期间，安阳发掘出土的古物大部分都随史语所搬迁到大西南。有部分珍贵的物品受损，史语所颠沛流离的途中，收藏品也有些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好多殷代的木炭，地层土壤的样品、各时期的陶器、未分类的文件和田野记录等。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几位田野工作人员的故世；他们第一手的观察，随他们的死亡而丧失，真可算是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不幸。

但是大部分安阳的发掘物，幸喜仍然无恙，可供详细的研究。我无必要来一一说明这一中国最重要科学报告迟迟未能完成的原因。在十分艰难的研究环境之下，《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编者已出版了 1928 年至 1937 年发掘的所有甲骨文的拓片。

我自己的兴趣，除了田野工作的一般计划和室内工作之外，早期集中于陶器，然后是骨器和石器，最近则是青铜器。我对史前及安阳期陶器的研究，出乎意料之外地使我最近对青铜器的研究大有裨益。这些研究的结果有一些散见于《中国考古学报》和其他的期刊中——都是中文的。在缺少经费又缺乏良好的印刷条件之下，《中国考古报告集》的编者几乎不能把这些研究照原计划出版。

当我在 1954 年得洛氏基金之助旅行美国及墨西哥三个月途中，我的朋友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主任泰勒教授写信给我，邀我在他的研究所担任半年(二学期)的 Walker Ames 访问教授，在研究生们的研讨会上，公开演讲我对安阳发掘的研究工作。于是，我有机会得以用英语发表我的一些意见。自从我在 1936 年到 1937 年间在英国大学作讲演

旅行后，就没有机会用英语讲演过。

这里印出的三篇讲稿，在到西雅图之前曾在另外的场合讲过。第一讲在剑桥的哈佛燕京社及墨西哥城；第二讲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墨西哥城；第三讲在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及民族学博物馆。我对广泛问题的探讨全部以发掘的材料作基础。

在准备这些讲稿出版时，我得到很多朋友的慷慨协助。泰勒(Dr. George E. Taylor)博士是首先建议印刷这些讲稿的。他的建议得到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富勒(Dr. Richard E. Fuller)博士和罗杰斯(Millard Rogers)先生，以及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同僚们的支持。李方桂教授在阅读草稿后，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对此我深表感谢。华盛顿大学摄影组以其卓越的技术，助我把幻灯片翻拍成底片供本书图版之用。克利得(Dr. Ruth Krader)博士和威赫姆(Hellmut Wilhelm)教授帮助我找参考书籍，这在生疏的环境下，一时我是难以做到的。最后我得特别感谢李方桂教授夫妇，在西雅图居停期间的照顾备至。

这本书中的很多图片是初次面世的。这种优遇我得感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博士。我也特别感谢该所给我的厚意。

李 济

第一讲

挖掘出中国的历史

四十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我说五千年，因为灌输于我那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恰是这个数字。据说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化可能起源更早，但是那些文化早已消逝了。印度人也有一个很长的文化传统。但是，一直到现在印度的学者从不认为他们的过去是值得记录的事。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无疑中国是依然卓立于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她有最悠久的——这是弥足重视的——延绵不断的历史记录。这是辛亥革命前我对中国过去的了解。

辛亥革命以后，事情开始变了。有一个时期，中国的革新者对过去的记载和关于过去的记载全都发生怀疑，也怀疑历史本身^[1]。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一项理性运动，其精神多少与欧洲十七世纪的古典运动相仿。他们的口号“拿证据来”在本质上说虽然

[1] 反映这时代精神最重要的文献是顾颉刚所编辑的《古史辨》，第一集发行于1926年。顾氏在这文集前面，写了一篇长序，主要写他自己对历史研究兴趣的变迁。恒慕义(A. W. Hummel)把这序译成英文，称之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恒氏在他的译前言中说：“这是一项对近代三十年来中国流行思潮的批判摘要。”他的译本出版于1931年，为 *Sinica Leidensia Series* 之一。

具有破坏性，但对中国古代的研究却带来了较多批判的精神。因此，如果你对尧舜的盛世给予过多的颂赞，好吧，拿出你的证据来。如果你论及公元前三千年大禹在工程上的伟绩，证据也得拿出来。我们得先记住，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之下，单纯的文字记载已不复被认为是有效的佐证了。

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一种打击，但却同时对古籍的研究方法产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现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1]

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毋宁说是回答那些以前历史家所含混解释的，却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问题。这样产生的问题属于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为有关中国文明的性质及其成长。

新的史学家常问：谁是最早的中国人？中国文明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想以近代考古学的发现为基础，试图回答以上两个问题，让我先谈一谈中国人的种族历史。

在中国地区所发现的智人(Homo Sapiens)*的例子，仍然以1933年周口店所发现的山顶洞人为最早。山顶洞所遗的头骨中，出乎意料之外竟包括了好几个种族。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曾在其1939年所写的初步报告中加以简单的描述^[2]。据魏氏所述，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三具头骨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种族因素——分别为原始的蒙古人种、美拉

[1] 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出版)。史语所的创办人及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在发刊词中讨论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般背景，并说明为求中国史学发展，探取新方法及新途径的急迫需要。

* Homo Sapiens 指有分辨能力的人属动物，通常译为“智人”；笔者惯用的译名是半意译、半音译的“有辨的荷谟”。——编者

[2] 见魏敦瑞：《东亚发掘的最早近代人类》(On the Earliest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Mankind Recovered on the Soil of East Asia)，北京博物学会会志拾叁册，1939，第161—174页。一般的叙述见同一作者的《猿、巨人和人》(Apes, Giants and Man, Chicago 1946)，特别是第四讲：“人种的原始及其分类的原则”。

尼西亚人种及爱斯基摩人种……”^[1]更使阅读这篇报告的人类学者感到惊异的是，这三具头骨所代表的三个人非常可能是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如果那时有所谓家庭组织存在的话。魏氏的论文在很多方面引起了非常有趣的揣测。其中之一是山顶洞人之骨骼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的可能关系。据魏氏的意见，如果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在二万年以前业已存在的话^[2]，他们决不可能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代表。他在《北京博物学会会志》上发表的这篇颇饶兴趣的论文的结论中有如此的叙述：

说到中国人(如果允许以这个名词作人种名称的话)的原始，周口店所发现的骨骼，无法给予任何启示。虽然如此，任何人不能断言中国人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尚未存在，因为美拉尼西亚人种和爱斯基摩人种已有存在的证据了。也许周口店那一家人是别处移居来的，被原住在该地的人所攻击消灭了。这些原住人才是中国人的代表……。^[3]

虎滕(Professor E. A. Hooton)教授大致赞同魏敦瑞的意见，但同时陈述他自己一个不同的观点。他以为魏氏所说的原始蒙古人种的山顶洞老人“……看来多少类似具有古代澳洲人种特征的原始欧洲白人，并且其头骨几乎与近代的虾夷人的头骨相同……”^[4]

虎滕教授的看法，不但把远东地区的近代人种与山顶洞的发现联系起来，并且更有意思的是，他把山顶洞的发现和古代中国神话传说连贯在一起。

[1] 魏敦瑞：《东亚发掘的最早近代人类》，第170页。

[2] 哈佛大学的侓维斯教授(Professor Hallam L. Movius Jr.)写信给我，告诉我他的意见：“由周口店山顶洞的动物来看，该地有住民的时间当为纪元前一万年左右，而非两万年。”

[3] 魏敦瑞：《东亚发掘的最早近代人类》，第173页。

[4] 虎滕：《从猿上升》(Up from the Ape)纽约，1946年版，第402页。